

走在西花厅的

小路上

(增订本)

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

章文晋 张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走在西花厅的 小路上

(增订本)

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

章文晋 张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 / 章文晋, 张颖著. —增订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097 - 5034 - 6

I. ①走… II. ①章… ②张… III. ①周恩来 (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620 号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增订本)

——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

著 者 / 章文晋 张 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宋 超 徐碧姝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若卉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5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215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034 - 6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和文晋都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本小书初版的文章是我多年所写，这次修订又加上了文晋的三篇和我后来所写的文章。

记得我写第一篇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字是他逝世一周年。那是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我把稿纸放在书桌上，拿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的泪水不断流下，那些稿纸都湿透了，而我伏在湿透的稿子上……这种情况连续了好多年。我内心深处填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这不仅是对周恩来同志，而是对党、对人民的感恩之情！

文晋的情感与我是一样的，但他是个内向的人，不轻易流露。这次修订收入的他的三篇文章原本是两篇。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那篇较早写成。另外两篇其实是他的一篇遗作。他基本写好的部分在他去世后即以《魂系周公》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一部分经整理稍晚发表于香港《紫荆》杂志，题目是《周总理与我家四代人》。我记得，为写这篇文章，他构思了几个月，思绪万千，却总觉得难于下笔。文晋是周恩来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复杂困难的局面中，文晋看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大智大勇与缜密潇洒，在成长的道路上深受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与鞭策，他的家人亦受到了周恩来同志如亲人般的关照。每每接到撰写回忆周恩来同志的邀请，他总觉得自己难以表达对周总理的伟业和人格的景仰，总为自己的笔拙而感到惭愧。

岁月如梭，在不少不眠之夜回首往事，我常常责问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为人民和祖国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写下些回忆的文字，有些是受邀，但大抵是受到一些青年朋友的鼓励，同时也总觉得有一种责任。最初来到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时，我只有十七岁，是红岩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已经离去，但这一代人的经历却不应被忘却。我希望，用自己真诚而非虚构的讲述，多少能为年轻一代留下些感性的历史。

我要再次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的鼓励和厚爱，使之能集成小书。我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对本书进行修订的建议和为再版所做的努力，在文晋百年即将到来之际，了却了他未竟的心愿！

张 颖

2013年8月8日

序	1
魂系周公	1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 1946 年	7
周恩来和我家四代人	20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29
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52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69
广州会议	78
上海“周公馆”	86
董必武、周恩来托起国统区一片天	94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	103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委	114
组织抗战文艺大军	130
雾重庆的企盼	136
父逝	
——恩来同志的遗憾	140
挚友·知音	
——周恩来与郭沫若	144

周恩来与茅盾在重庆的交往	151
夏衍心目中的周公	157
周恩来、孙维世和金山	168
周恩来与陈荒煤	178
他心中装着多少人	
——周恩来与冰心、常书鸿	190
周恩来喜欢戏剧又爱提意见	196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199
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204
傅天仇:终生追求周恩来精神的人	209
发挥革命历史剧的教育作用	
——从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说起	213
我心中的邓颖超大姐	217

魂系周公^{*}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15年了。在这千百个日日夜夜里，我常常想起他那伟大的一生。他的情操、人格、学识和作风，使每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敬佩、信赖和亲近之感。回想起他的言行风采，宛如昨日，历历在目，但又恍若隔世，心头总是泛起一丝隐隐的哀痛。今年1月8日，我曾到纪念堂缅怀，心潮澎湃，难以平复。在那里遇到不少同志，都期待我能写出多年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体会。我不安地感到这是我应做却一直未做的事情。每当我回首往事，深深思索，很多很多……提起笔来，却只是点点滴滴，不成文章。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60年前。1930年春，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六大以后的工作，并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4月下旬，他路过柏林，在成仿吾住处约见当地中共党员。那时，我正在柏林学习，十五六岁，是一名青年团员，不过却有幸被吸收参加了约见。在那次会面中，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分析国际形势，介绍国内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他那清晰的思路

^{*} 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3月5日。原编者按：这是章文晋同志为1991年3月初参加一个周恩来纪念会所准备的发言稿。修改未完，他不幸因病去世。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潇洒儒雅、令人倾倒的青年人的姓名。直到他离去后，成仿吾才告诉我，他就是南昌起义的著名领导者周恩来。

1944年冬，我从昆明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1945年8月下旬，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天，他遇到我，问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曾在柏林听过他讲话，他立刻高兴地笑着说：“原来是老相识啊。”几天后，毛主席会见加拿大大使，由我做翻译。从这时起，我就直接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了。恩来同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耐心地给予具体指导。严厉而又充满爱心正是他的风格。这点我从一开始就体验到了。记得有一次，我起草一篇抨击国民党的发言稿，送给他审查。他很快地看了一遍，微微摇头，随即指点我：一个猎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就命中靶心。我立刻明白了这篇稿子的缺陷是四面出击却没有攻中要害。当我很快按他的提示改好，再送他审阅时，他点头看着我，满意地笑了。或许那时，他感到孺子可教吧。

1945年底，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矛盾。恩来同志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加谈判。我跟他当秘书和翻译，亲眼看到他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做的不懈努力。谈判期间，恩来同志所表现出的不避艰险、不辞辛劳的献身精神，使我终生难忘。1946年5月，他和美国代表白鲁德以及国民党代表一起到武汉以北100里的宣化店调查中原解放区国共冲突的情况。我随同前往。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途中一座桥梁被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国美两方代表都想退回去。恩来同志为争取时间，制止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坚持涉水过河。他让随去的当地同志找来十几个农民，把四辆吉普车抬过河，并把国美两方代表也背了过去。当农民争着背恩来同志时，他动情地说：为争取和平，你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说着，脱下鞋袜和长裤，向河里走去。恩来同志的举动完全出乎白鲁德的意料，他立即拿起相机摄下了这一镜头，并告诉我，他要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



1954 年随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三排左一为章文晋



1972 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北京会谈 右四为章文晋

私人留念。当恩来同志向河中走去的时候，何谦同志紧随其后。我动作慢，刚提起鞋，就见恩来同志回过头来，向我说：“文晋，能行吗？”或许他看我是一介书生，缺少在风浪中的磨炼，所以特别关照。可我明白，这也是对我的鞭策。我立刻加快步伐，跟随着恩来同志，趟过这百米多宽，水深及腰的河去。1980年，我在华盛顿与白鲁德先生久别重逢，他还为此赞叹不已。以后，他特地送我一幅照片，便是当年恩来同志涉水过河时穿着军上衣和短裤站在水中的留影。就是从这种一点一滴的小事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以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仅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甚至能赢得政治对手的钦佩和尊重。

内战爆发后，在繁忙军务中，恩来同志还抽空给中央外事组写信，指示我们加强对外宣传，了解世界大事。我知道，这也是为建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做准备。解放后，我到天津外事处工作，不在恩来同志身边；但他作为政务院的总理，日理万机，还常常挂念着我。50年代初，中央在组建各大部时指派黄敬同志负责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筹办。因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在贵阳地下党工作时，又干过汽车机械方面的工作。黄敬让我跟他一道搞汽车工业，我也有心回老本行。一次我到北京出差，恩来同志知道后，半夜把我找到西花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理于情，循循善诱，从世界大势讲到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同时分析我的具体情况，说明外事干部十分缺乏，使我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留在外交战线。这样，我才幸运地有更多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机会参与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正值我当部长助理分管欧美事务时，亲身参加了打开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外交谈判。中美关系的恢复不仅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同时还开创了国际战略关系的新格局。应该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主席的决策，但恩来同志不仅参与了这一决策，而且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例如，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中央委派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前往巴基斯坦迎接他。临行前，总理反复交待了中央确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但他仍放心不下，又特别嘱咐我

说：“我知道你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关键的细节上，都贯穿着周恩来同志的智慧和灼见。双方讨论尼克松访华公告时，焦点是在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究竟哪一方更主动。我们认为，因为尼克松首先表现出访华的意愿，我方才提出邀请；而基辛格却认为，总应该是邀请在先。黄华同志和我与基辛格一连谈了两个晚上也没有谈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报告。周恩来同志沉吟片刻，提起笔来，只在我们起草的公告稿上增加了“获悉”两个字，就说明了此事的经过是我们了解到尼克松总统有访华愿望，于是发出邀请。这样，双方就都能接受并感到满意了。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才能真是让人叹服。

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培养，不仅有耐心的指导，也有严格的批评。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1954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一天，发往国内的一篇外国新闻社的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同志严肃批评我，指出这是对大事不负责。几句话使我难过万分，终生引以为戒。还有一件是，“文革”期间，英国代办处被烧。重建后，总理让我在出席英方举行的招待会时，向英国代办祝贺并在适当场合致以歉意。而我因为那天出席招待会的人很多，一直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所以没有致歉。周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把我找去，批评说：“你受极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不说，我只好自己说了。”随后，他亲自约见英国代办，向对方表示，火烧英国代办处不是中国政府的意思，现在重建好了，我向你祝贺。当时，我就在周恩来同志身旁，看着他憔悴清癯的面容，想到由于我的过失而未能为他分忧，深感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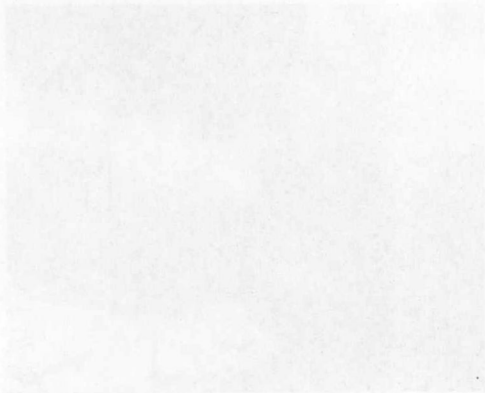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志虽然对身边的同志要求严格，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更可贵的是，他严



周恩来、章文晋、卓别林在日内瓦

于律己，身教重于言教。这里我就举这样两件事情。那都是在马歇尔使华，我刚开始为他做翻译的时候。一次，国共美三方会谈，我把一份会谈的备忘录落在休息室里，直到临走时，经周恩来同志提醒，才把它找了回来。周恩来同志当场严厉地批评了我。随即在汽车里，他又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我年纪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经验，我应该事先提醒你。”最近，熊向晖同志在纪念总理的文章中提到，周恩来同志一次从延安回重庆，也是由于一时疏忽，把自己的一个笔记本落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这里我就此事补充一个细节。其实，周恩来同志一回到红岩，就发现笔记本不见了。他立即让我去找，并马上召集党的核心会议做检讨。我乘汽车飞快地驶往马歇尔的住处，从他的副官那里取回笔记本，随即赶回驻地。来回至少近两个小时。可到家一看，周恩来同志还在那里检讨呢。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同志，从没想到过，他作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竟按照党的纪律做如此严格的反省。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 1946 年*

从 1945 年以来，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我曾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他领导下，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外交谈判。在我的印象中，像 1946 年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那样旷日持久，其外交对手有像马歇尔那样声望的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其高超的谈判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我为周恩来当翻译

1944 年冬天，我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那时正值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插手调解国共关系。以后，从 1945 年底至 1947 年初的马歇尔使华，则是美国政府企图进一步调解国共关系。我在八路军办事处（中共

* 原载《中华英烈》1988 年第 2 期。章文晋著。

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头10个月与周恩来接触甚少，主要因他当时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正赶上我们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此外，也由于赫尔利调解活动很快就陷入僵局，赫尔利对我党充满敌意，关系急剧恶化。

抗战胜利后，应蒋介石邀请，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抵达重庆会谈。三位领导同志曾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周公馆接见我党在重庆南方局和报馆工作的全部同志。周恩来同外事组的几位同志见了面。王炳南、龚澎和李少石都是周恩来十分熟悉的，而我还算是个新人。我自我介绍说，1930年春，他秘密去莫斯科经过柏林时，曾接见过几位留德学习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我也在场。我的父亲还是他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周恩来笑着说，他还记得这些事。

30日，毛泽东从桂园迁到红岩下榻。那时，荣高棠同志正好组织我们排了一个戏，他也拉我参加。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舞台艺术实践。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都来看戏，但他们只看了一幕就退席了。第二天早晨，周恩来见了我就说：“我认识你父亲就是在戏台上，我们曾在南开中学同台演戏；现在看到你也是在戏台上。”

重庆谈判后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访问了一些主要国家的驻华使节。当他们去见加拿大大使时，我被指定做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党的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结果出了一点笑话。因要我先独自到使馆等候，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达时我已在客厅内。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起身与使馆人员道别。他也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表示感谢。看来是我穿的那套西服使他把我误认为使馆的译员了。他称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还不错嘛！”我连忙解释：“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实际上，直到马歇尔来华之前，几乎所有的重要场合都由龚澎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她同时还担负着联系驻渝外国记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正随着国共和谈的进展而变得十分繁重。马歇尔抵华前夕，她正式建议，由我接替她的翻译工作。那时，我已为周恩来做过几次翻译，他对我已比较熟悉，就同意了。这样，我就以译员的身份，参与了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12月22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三位同志也到机场去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位同志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活的原因。

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问题。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1月10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1月9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